

社会阶层及其组织

中产阶级与埃及政局变化*

戴晓琪

摘要：本文认为，2011年埃及变局主要归因于中产阶级的民生问题。萨达特—穆巴拉克的政策以及各种外力导致了埃及社会结构的扭曲，引发中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下降、经济能力减弱、生活困难加剧，使中产阶级由社会的引领者变为政权的抗争者，最终颠覆了穆巴拉克政权。本文分析了中产阶级与这一社会变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后强调，2011年埃及变局将有利于中产阶级的重新崛起与社会结构的合理发展。

关键词：埃及；中产阶级；变局；阿拉伯剧变

作者简介：戴晓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副教授（北京 100024）。

文章编号：1673-5161（2012）01-0052-12 **中图分类号：**D013 **文献标识码：**A

*本文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级重点课题“当代埃及社会结构”前期成果。

2011年，阿拉伯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突尼斯、埃及与利比亚旧政权相继解体，由此引发的外溢效应至今仍在阿拉伯世界蔓延，许多阿拉伯国家的街头运动仍此起彼伏，未来政局走向扑朔迷离。如何认识阿拉伯核心国家埃及的剧变？什么原因导致埃及自1952年以来的又一次巨大政治震荡？震荡是内源性的还是外源性的？这是分析2011年阿拉伯变局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在旧政权已经解体的三个国家中，除利比亚受到外力直接干涉导致政权倾覆外，突尼斯与埃及剧变的主要原因在内部，其核心问题是民生与民主，但也有外力的严重干预。本文将从民生的角度解读埃及政局变化，认为埃及的民生问题主要体现为中产阶

级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综合下降。在当代，埃及中产阶级逐渐被边缘化，这是埃及政治变革的主因。事实上，不仅在埃及，所有走依附性资本主义道路的阿拉伯非产油国都正在遭遇政权动荡的困扰，而动荡的主因也都是中产阶级的被边缘化。笔者将通过对埃及中产阶级的变化轨迹分析，解读 2010 年年底以来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剧变。

一、埃及中产阶级的生存背景

（一）历史境遇决定了阿拉伯世界有限的发展空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阿拉伯世界虽然取得了民族国家的独立，但却丧失了阿拉伯世界政治的统一性。这一时期，阿拉伯世界既不像希腊、罗马、土耳其时期那样完全成为跨洲帝国中被主宰的一部分，也不像阿拉伯—伊斯兰时期那样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整体甚至主宰其他地区。作为独立而统一存在的阿拉伯世界如今变成了历史，它进入了几千年分分合合历史变化中最破碎的时期，在逻辑上仍处于奥斯曼帝国衰败所导致的帝国大解体中，或是“粉碎性骨折”^①之中。这一骨折时期不是阿拉伯世界最衰弱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阿拉伯世界仍具一定力量，但受国际力量的极大制约，处于内外力间的某种平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阿拉伯人的生存与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困惑：国家与民族范畴不一致，阿拉伯民族与伊斯兰教的双重属性困扰着其身份认同；国家在内外力量的反复较量中颠簸，民族政权虽拥有自主发展的意愿与机会，但却难挡大国霸权主义的侵略行径；国内的主流意识与发展模式模糊不清，传统与现代思想反复纠结，传统力量与西方发展模式激烈冲突，欧美模式与苏东模式机遇性地被选择与采纳。这一民族经历了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罕见的艰难与煎熬，内部纠纷与外部冲突接连不断。

如今，阿拉伯世界已走出了“大一统”模式，既不再举世瞩目，也不再默默无闻。历史决定了其已立足于民族之林，但却只能占据有限的发展空间。在“大一统”历史的辉煌记忆与弱势小国的痛苦现实之间，阿拉伯人思考着其生存之本和自我归属。由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支离破碎，其发展道路必然摇摆不定，在应对挑战时，无法形成可依赖的战略发展模式或“现代化模式”。

作为“领头羊”的埃及见证并经历了这一时期阿拉伯世界的种种历

① 田文林：《地缘政治、中东破碎地带与利比亚战争》，《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 年第 4 期。

史困境。过去 200 年间，埃及社会结束了长期停滞的状况，开始加速变化。穆罕默德·阿里、纳赛尔的伟大改革与伊斯梅尔、萨达特、穆巴拉克的曲折尝试交替形成了埃及现当代的历史图景。

（二）冷战后的环境导致埃及发展模式的变化

20 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战败的埃及急于通过战争夺回失地，但受制于苏美的制衡战略。20 世纪七十年代前期，埃及在成功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并取得部分胜利的同时，适时摆脱对苏联的依赖，转而投向了美国。选择这一新“盟友”对埃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引起了埃及社会的重大变化：纳赛尔曾高举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与不结盟政策被抛弃，自由主义、市场机制与依附西方被确立为新的发展模式。这一新模式后因苏东剧变与伊拉克战争得以进一步加固，苏东剧变宣告了苏联模式的失败，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对所有敢对美“叫板”政权的警告。此外，还有两个因素助推了埃及对新模式的选择：石油价格的飙升与美国对埃及债务的减免。20 世纪七十年代后，埃及以本国石油的出口与在外劳工的侨汇获取大量美元，石油等地租式收入替代传统工农业成为国民收入的新支柱；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减免埃及外债的一半，将埃及从经济破产的泥潭中拉了出来，埃及政府在感激之余也被迫许下“自由主义改革”的诺言。

正是由于内部问题的不断堆积与外部压力的逐渐增大，埃及在半个世纪中被迫对发展模式进行了两次调整。阿斯旺大坝贷款与反殖民情结使埃及加入了苏联阵营，开始实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以色列在中东的崛起与苏联在冷战中的败北又迫使埃及近美远苏，从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转入了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同时，石油经济摧毁了埃及的传统产业结构，而美国巨大援助彻底将埃及拖入了依附性资本主义的行列。

（三）新发展模式导致埃及经济结构的扭曲

纳赛尔建立的国有经济体系在萨达特“门户大开”政策中遭到冲击。由于连年战争尤其是 1967 年战争的惨败，纳赛尔执政末期的埃及经济几近崩溃。在 1973 年战后有利的国际环境下，萨达特决心结束与苏联的同盟关系，启动依赖美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允许国际资本全面进入，退还纳赛尔时期没收的地主土地与资本家财产。他全力支持资本家阶层的崛起，甚至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最大承包商的儿子，另一个嫁给老地主的儿子。此后，大量资金在埃及涌现，包括来自西方的援助与投资，1973 年战争后世界油价飙升带来的石油出口收入与海外石油侨汇，以及和平环境带来的苏伊士运河过境税与旅游收入等。但这种地租式经济的增长并未给埃及带来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反却加速了埃及传统实体经济的衰

落。萨达特政权过分依赖美国与跨国公司，未能立足民族产业的发展，加上纳赛尔长期奉行的均贫富思想刚刚结束，国内资本与国际资本均无心做长线投资，服务与金融等短期项目成为投资主流，造成产业队伍的流失、服务业的提前扩张与民众的超前消费。宝贵资金没有转化为工业建设的动力，使埃及产业不仅错过了一次绝好的发展机遇，而且被消费主义与“热钱”缠身，本国制造品不仅在部分地区内丧失了相对优势，甚至在本国市场中的份额越来越小。

穆巴拉克的私有化改革以及石油价格大跌导致埃及国有经济体系全面瓦解。经过最初 5 年高油价带来的经济“繁荣”后，穆巴拉克政权遭到 1986 年油价大跌的重创，长期以来因官僚机构臃肿与国企萧条造成的经济问题浮出水面。1991 年海湾战争中近百万劳工逃回国内，给危机中的埃及经济最后一击，致其濒临破产。此时美国及其盟国因海湾战争急需阿拉伯国家支持，遂许诺免除埃及 500 亿美元外债的一半，埃及被迫接受这一方案，用政治资本换取了西方的经济救助，并按照西方意愿改革经济体制：将国有经济全面私有化，开放金融货币市场，压缩行政事业开支，关闭大学生分配大门，缩减社会保障，降低对教育与医疗的投入。

经过 20 年的经济改革，埃及彻底走上了依附性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道路。埃及的工业、商业、金融等各个行业基本完成了私有化，钢铁等主要行业都已被私人资本或国际资本所垄断。私有经济控制了国民经济，金融寡头逐渐掌控了埃及经济的命脉，国有经济不再发挥重要作用。更有甚者，实体经济衰落，地租式漂浮经济主导社会，使社会陷入消费经济而非生产经济之中。私有化改革结束了计划经济，不仅没有带来公平竞争，反而引起了钢铁与电信业等行业垄断，经济结构比私有化以前更加扭曲，埃及经济长期陷入了“三高一低”的困境（高赤字、高通胀、高外债与低就业）之中。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都陷入了“死胡同”。

（四）经济结构扭曲引起了社会结构的恶化^①

从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到纳赛尔革命，埃及社会经历了两次结构性变化：第一次是在阿里家族时期，社会由土耳其封建军事贵族与埃及土著人组成的两极结构，向以地主与外国资本家为上层、富农与民族资本家为中层、贫雇农与工人为下层的社会结构过渡。本次变化源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压力，其特点是社会阶级的划分依据从身份、军事因素转向财

^① 戴晓琦：《19 世纪以来埃及阶级结构的演变及其对当前社会的影响》，《西亚非洲》2011 年第 6 期。

产因素，阶级结构从难以逾越到易于流动，阶级关系从原来的民族矛盾减轻到国内矛盾，阶级斗争从极高烈度的暴动与革命逐渐转向较低烈度的示威游行与议会斗争，社会结构从身份等级向财产等级的变化顺应了历史发展；第二次变化是在纳赛尔时期，社会从以地主与外国资本家为上层、富农与民族资本家为中层、贫雇农与工人为下层的社会结构，转化为以国有企业干部与富农为上层、贫雇农与工人为下层的梯形结构。本次变化源于纳赛尔改革，其特点是社会阶级划分依据从军事与财产因素转向政治与财产因素，阶级间的流动更加稳定有序，阶级关系从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两极差距大大缩小，社会融合明显增强，20世纪六十年代，社会的上层（即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20%~25%，下层阶级占75%~80%。社会结构从财产阶级向政治阶级的变化，大大降低了社会矛盾，化解了阶级冲突。

萨达特—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社会经历了第三次社会变化。社会重新扩大为不断壮大的上层资本家、衰落的中产阶级以及每况愈下的底层等三个阶级。其变化源于萨达特的对外开放、穆巴拉克的私有化改革、石油经济的崛起、国际格局从苏美争霸向美国一极变化等。原有的上层（即阿拉伯学界所谓的中产阶级）崩溃，社会分化出上、中、下三个新的阶级。新上层由外国资本家、本国新资本家与复苏的老资本家构成；新下层由原来的下层、原中层中的国企工人、城市无业者与丧失土地的农民组成。上层与下层已于21世纪初完成了自身的阶级重建。中层仍在建构之中，但轮廓已基本清晰，包括各种技术人员、行政中下层、私企老板、大部分店主。1991年上层占总人口的3%，中层占45%，下层占52%^①；2006年上层占18.4%，中层占12.4%，下层占69.1%。^②

如果说前两次变化都具有社会进步性的话，那么第三次变化则违反了社会发展的良性规则，是社会倒退的表现。社会上层和下层都明显扩大，社会中层明显缩小，阶级结构从梯形趋向于“哑铃”形。纳赛尔时期，埃及社会的两极距离缩小，阶级结构趋于梯形，呈良性发展态势。萨达特—穆巴拉克时期，社会两极的距离明显扩大，阶级结构趋于金字塔，呈恶性发展态势。穆巴拉克后期，社会上层和下层都明显扩大，社会中层明显缩小，阶级结构趋向于“哑铃”形，社会发展趋势更加恶化。

而且，在第三次变化中，阶级流动的方向错综复杂且背道而行。由

① 贾拉勒·爱敏：《1945~1995年间埃及发生了什么》，开罗：新月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② 笔者根据埃及国家统计局《2006年埃及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表9计算出的数据。

于石油、开放以及私有化等因素的作用，社会成员的地位出现了大规律的流动，流动不仅在同一阶级内部的各个阶层之间加速，而且出现跨阶级流动，下层成员跃至上层，上层成员降到下层。流动方向趋于复杂，且以大规模向下层流动为主。这种突然升降同时出现，扰乱了民众的心理预期，动摇了民众对社会的信心，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在1970年以前，埃及的贫困率在30%左右，经过萨达特—穆巴拉克改革，1981年达到40%，而2007年升至48%。^①据埃及经济部与世界银行于2007年发表的《埃及贫困分析》披露，仅农村最贫困的1000个村庄就有100万家庭的500万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占这些村庄人口的46%。^②

近年来埃及社会阶级壁垒日益加固，随着1991年私有化的全面实施，埃及的主要产业基本被私有化。大多数原中产阶级成员下岗、转制、被边缘化，最后加入到本已十分庞大的下层社会。从收入结构看，固定资产收入不断增加，工资收入比例不断下降，财产在社会贡献中的份额显著上升，表明阶级壁垒不断加固，阶级跨越越来越难，上层和下层基本定型。

二、埃及中产阶级的生存现状

（一）中产阶级被边缘化

由于政治、经济模式的转变、石油等地租经济的崛起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中产阶级在萨达特—穆巴拉克执政时期遭到了致命打击。中产阶级中的大批成员滑向下层，少数升入上层，导致中产阶级的规模减少。极少数行政官僚与国企干部利用钱权交易在私有化中上升为新的资本家阶级，行政、事业、国企的普通人员的生活则在通货膨胀中恶化，大部分人沦落为社会下层。1991年开始的国企私有化导致50万国企工人下岗与提前退休，1996年土地租赁政策将大批农民驱逐出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所有这些导致了中产阶级全面解体，形成了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整体性下降现象。^③埃及著名学者拉木兹·宰齐（Ramzy Zaay）于1997年发表专著《别了，中产阶级》，引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共鸣，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于1998年发行的《埃及状况》创刊号便是“埃及中产阶级”专刊，而同一时期贾拉勒·爱敏出版的《五十年埃及发生了什么》

① 哈穆·迪侯赛因：《工人意识》，社会主义阵营中心，2007年12月7日，<http://afaq.yasary.com>。

② 2010年《埃及人力发展报告》，第30页。

③ 马赫迪·穆罕默德·卡萨斯：《埃及中产阶级的贫困化机制》，第33期。

更是全面阐述了中产阶级衰落的深层原因。所有这些充分证明了埃及中产阶级衰落对社会带来的巨大震撼。

埃及的中产阶级不仅从规模上大幅缩减，在社会功能上也被边缘化。纳赛尔依靠中产阶级取得政权，中产阶级成为共和国建立后的政权基石，土地改革与国有化运动都依靠这一阶级推行，而该阶级也在土地改革与国有化运动中迅速成长壮大。但在萨达特—穆巴拉克时期，国家的战略实施主要依靠新生的资本家阶级，依赖资本家阶级而非中产阶级完成了运河区 3 座被毁城市的重建，建立了数十个新的工业城市，建立了新的金融与贸易体系。在战后恢复性建设与石油收入带来的扩大建设中，许多建筑承包商、外贸商人、金融投机者应运而生，构成埃及新的上层阶级。此后，工业资本家等也加入这一行列。中产阶级在精简规模、压缩开支、降低福利中逐渐被边缘化，生活质量大幅下降，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主要包括：

(1) 就业难。中产阶级即便找到工作，也不再是铁饭碗。为避免承担各种保险或保障，行政、事业、国企等原先的铁饭碗行业近年来以招临时工为主。目前生产领域的临时工比例占总数的 70%，其中 49% 为家庭管理模式。^①为维持家中正常开支，中下等级的公职人员大多在正式工作外兼职，如开出租车、搞推销、在各种服务机构打杂等。许多人被迫以各种非正式工作为生，这些行业未在工商、税务部门登记注册，包括出租业、小商贩、大部分店铺、家庭作坊等，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据统计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有 687 万以上，占总劳动力 1818 万的 1/3^②（一说 430 万^③）。

(2) 住房难。因中产阶级难以承担迅速攀升的房价，导致新一代年轻人无法像上一代那样获得住房，只好滞留父母家，或在郊区甚至偏远地区购买房屋，或租房度日。恶劣的住房环境迫使埃及人在未获得政府许可的情况下，或在自家屋顶上随意叠加房屋，或在城市周围的沙漠空地强行建房，形成十分刺眼而混乱的违章建筑群，这些楼房的楼间距大多一两米，楼内缺乏基本配套与安全设施。这种违章建筑区在埃及城乡多达 1000 多个，占全部城市住房的 1/3，其中在坟墓区居住的人口超过

① 阿布杜·巴斯特·阿布杜·穆阿忒：《1975~2020 年间的埃及社会阶级及其前途的变化与互动》，开罗：米瑞特出版与信息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阿布杜·法塔赫·贾巴利：《当代埃及经济问题中的萧条与发展》，开罗：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 2004 年版，第 137 页。

③ 赛伊德·阿布杜·哈里格：《非正式经济的渊藪与影响》，<http://www.tohoti.com/bookces.asp?artid=10>。

100万。房屋因年久失修或质量问题引起的倒塌事件频发。在整个千万人口的开罗城中，10多年来基本看不到新建的住宅。

(3) 结婚难。工作与住房的困难导致埃及人很难结婚成家。埃及人有早婚早育、子孙满堂的传统习惯，法定结婚年龄为18岁。但由于生活压力增大，实际结婚年龄已推至30岁左右。这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如性交易与性犯罪蔓延，未经法律程序的事实婚姻比较普遍等。

(4) 求学难。埃及目前有官办学校、私立学校以及外国学校等三种教育体系，都从幼儿园延伸到大学，其中官办学校基本免费但质量很差，毕业后基本没有出路。因此，埃及中产阶级大多不惜巨资，将子女送到私立学校甚至更好的外国学校。无力承担后两者费用的中下层家庭，也会倾力让子女接受家庭辅导。据称，居民在家庭辅导中的花费已超过政府在教育上的总投资。

(5) 医疗难。萨达特政权以后，随着国家对医疗投入的持续减少，公立医院虽基本免费但医药与医疗质量明显下降。与此同时，私立医院纷纷出现，这里收费高但服务好。中产阶级面对昂贵的私立医院望而却步。

(二) 中产阶级竭力摆脱困境

为阻止生活状况的不断下滑，中产阶级难以再致力于社会发展与国家富强，而是被迫关注自己的生活琐事。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手段维持其阶级地位：

首先，大批中产者前往石油国家淘金。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全球石油经济崛起，埃及政府在就业压力下为出国潮大开方便之门，允许工薪人员带薪休假，数百万中产者奔赴阿拉伯产油国谋生，成为第一批阿拉伯石油劳工。这一淘黑金浪潮一直持续至今，期间虽因国际局势与国家间关系而受到影响，但埃及石油劳工的数量一直保持在数百万之多。石油劳务使许多中产者维持了生计，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

其次，中产阶级中的有权者利用政治资源寻求钱权交易。在包括金融贷款、外贸批件、承包项目、土地开发等各垄断经济领域，甚至许多公共事业领域，行政人员都存在明显的寻租行为，从而使钱权交易不仅司空见惯，而且成为社会通行的潜规则。

再次，政府的无权者力求通过开辟第二、第三职业补贴家用。在上班前与下班后，他们争分夺秒地开出租车，摆地摊，或在私人单位打零工。他们的妻儿老小也加入到劳动大军之中。纳赛尔政权以前，中产阶级家庭妇女儿童很少外出工作。但在萨达特推行开放政策以后，随着数百万男子出国或进城打工，他们的留守家庭成员自然地承担了生活甚至

工作的重担，开店、摆摊、做导游等等。艰辛的生活使绝大多数中产家庭的妇女也走出了家门，进入社会寻求谋生之道。

最后，传统就业大门关闭后，中产者的子女以及下岗人员用各种手段开辟新的就业渠道。现在，埃及城乡出现了数十万个个体户与家庭作坊，其中大多曾经属于中产家庭。

正是由于中产阶级的普遍衰落，导致体制外形成了庞大的非正式生产部门，其劳动人员多达 500 万~600 万，成为埃及最大的就业领域。

（三）中产阶级的没落导致主流价值观的崩溃

伴随着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下降、政策的错误导向以及周边大环境的重大变化，埃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化。许多传统美德被抛弃，许多人不再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关爱他人，转而追求不择手段地一夜暴富，模仿新贵的奢华生活，炫耀式地消费，追求金钱与权力等，各种不良现象开始在埃及社会泛滥。同时，尊老爱幼、社会责任心与国家荣誉感在个人利益的追逐中被抛之脑后，个人主义代替了集体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许多埃及人蜷缩在个人家庭生活中，对政治不闻不问、失去兴趣，对社会不理不睬、冷漠相待。他们不再愿为阿拉伯与伊斯兰问题走上街头，积极寻求办法，而是拒绝参加各种选举，拒绝参与各种公共事务。许多人不仅冷眼看待社会，对个人生活与工作的进取心、创造力也丧失殆尽。尊古与教条成为许多埃及人生活的法宝，而对自身的能力与意志丧失信心，惧怕各种变革，完全丧失了自我，丧失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因此，在当今的埃及，或贪婪地进行攫取，或沉湎于个人世界，或贩毒吸毒、纸醉金迷，或结竿而起成为“暴民”，已是埃及社会的普遍现象，折射出中产者对社会与政府的无奈和绝望。

三、中产阶级与 2011 年埃及政变

（一）绝望的中产阶级引发了社会动荡与变革

中产阶级日趋窘迫的现状迫使他们走上了对抗政府的道路。1977 年 1 月，萨达特政府在西方的压力下出台“食品涨价令”，规定大饼等主要食品涨价 1/3 以上，这大大超出中产阶级的承受能力，于是他们连续三天发动全国性暴动，许多象征政府权力的建筑物被焚烧。此次暴动动摇了萨达特政权的合法性，迫使政府收回成命，停止涨价。在萨达特统治的后期，埃及结束了纳赛尔营造的社会稳定局面，进入了动荡加剧的时期。1981 年 10 月，极端分子枪杀了萨达特，也否定了这位总统的对内改革开放、对外联合美以的政策，伊斯兰极端势力由此发端，获得越来越多中

下层民众的支持。

20 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穆巴拉克政权在高油价支撑下保持了难得的社会稳定。但自九十年代开始，被边缘化的中产阶级开始全面反抗政权。九十年代上半期的反抗运动主要由城市中产阶级发起，国企下岗工人、中下层公务员也开始了罢工与示威游行。自 1996 年开始，乡村农民公开抵制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一度在多处建立军事自治，与政府军展开武装对抗。“9·11”以后，埃及政府受到西方大国的严厉指责，中产阶级获得了抗争的大好环境。2004 年美国出台“大中东改造”计划，中产阶级开始公开抨击穆巴拉克的各种政策，以“够了”运动为潮头的公民社会组织在埃及纷纷出现，它们组织了大规模的罢工与示威游行，工人集体抗议行为开始明显增多，从 2005 年的 202 起，发展到 2006 年的 222 起，2007 年猛增到 617 起。这些运动通常以要求提高经济待遇开始，以暴力对抗政府结束。政治矛盾代替经济矛盾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埃及的社会风险上升至政治风险。

2008 年年底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又沉重打击了埃及经济，使中产阶级的生活更加艰难。在 2010 年议会选举中，政府一方面大量拘捕主要反对派领袖，另一方面对已执政 30 年的穆巴拉克的儿子贾迈勒进行大肆宣传，这意味着埃及政治很有可能在半个多世纪的民主共和后再次出现“家天下”的局面。中产阶级甚至是作为军队主体的中产者，对穆巴拉克政权彻底绝望。2011 年 1 月，突尼斯长期执政的本·阿里政权瞬间被推翻，大大激励了同一处境中的埃及中产阶级，他们立刻走上街头，以中产阶级所特有的方式终结了执政 30 多年的穆巴拉克时代。

（二）2011 年埃及变局中的中产阶级

2011 年埃及变局是一场中产阶级主导下的革命，理由是：

街头运动的发起者是数万名“脸谱”（facebook）网民，他们来源于中产者家庭，普遍拥有电脑，掌握网络等现代通讯技术，拥有大量闲暇时间上网。他们不属于社会下层，埃及社会下层至今还无力拥有家庭电脑和使用互联网等现代技术的条件。

街头运动的口号是“尊严与自由”，这是政治与经济合一的口号，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口号。中产阶级不仅追求经济利益，而且追求政治目的。而社会下层阶级的斗争一般以经济利益为主体，很少诉诸政治追求。

街头运动的形式自始至终是有组织的，是和平而非暴力的。有组织的和平运动是埃及中产阶级惯用的政治行为，他们一般不采取暴风骤雨的颠覆性行动。而下层阶级的运动则与此不同，常常伴随剧烈的冲突与暴力活动。

从街头运动的人员组成看，街头运动首先出现在吉萨省的穆汗迪辛（Muhandisiin）和伊斯梅利亚省等典型的中产者集中区。在1月25日抗议队伍与军警大规模冲突后，产业工人从迈哈拉（Mahalla）和哈勒万（Halwaan）的纺织与钢铁工厂集体走向市中心区解放广场，彻底摧毁了穆巴拉克的信心。这些工人是纳赛尔时期国企工人的主体，也是中产者在劳动领域中的中坚，但他们的社会处境在穆巴拉克时期已与下层差别不大。

从运动的发展过程看，在迫使穆巴拉克政府解体后，运动的主体成员基本退出。目前的抗争主要来自不甘心退出舞台的上层与利益诉求毫无收获的下层。中产阶级的主要目标已经达到，他们开始忙于组建政党，以便在未来的政坛中瓜分到更多的战果。

从过渡政府的政策看，明显体现了中产阶级的立场与观点。过渡政府已经宣布停止“私有化”改革，但仍坚持穆巴拉克时期的主要政治立场，仍坚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对外依附西方的国策。更加明显的证据是，政府通过各种方式阻止“继续革命者”走上街头，反复宣传动荡对埃及经济的巨大损失。这都说明，在赶走压在自己头上的外国金融寡头与国内大资本家后，中产阶级已经心满意足，无需继续探究埃及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核心问题，无意彻底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

（三）2011 埃及政变后中产阶级的前景

2011 年的埃及变局将对埃及中产阶级产生重大的影响：

从政治上讲，这是一次中产阶级的光复运动，变局的结果是原来的上层资本家阶级被推翻，他们有的携款外逃，有的被扣押拘禁，中产阶级正在接手萨达特—穆巴拉克时期培植的上层的权力。虽然权力架构的真正重组尚待时日，但中产阶级已显示出了自己的强大力量。从中长期看，他们的政治意识与政党组织必将占据未来政治架构的主体，主要政党将代表他们的意愿与呼声。

从经济上讲，随着跨国公司与买办阶级势力的倒台，埃及民族产业尤其是工农业将有一次较大的发展机遇。同时，私有化改革将明显放缓甚至终止，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将明显加大，政府将对包括教育与医疗在内的服务行业加大支持与投入。自由主义势头将受到遏制，国家主义会有所抬头。行政、事业与国企力量将有所扩张，国有产业会得到支持并有所发展。由此，中产阶级将停止萎缩态势，从功能和规模上都将得到明显的恢复。

从社会结构上讲，随着上层权力被明显遏制、下层大众的生活开始受关注，上层的社会地位将下降，下层将实现部分的向上流动。在上、

下两个阶级规模缩小的同时，中产阶级的力量与规模将扩大，社会结构将停止两极化发展的趋势，逐渐向比较理想的橄榄形过渡。

从文化层面上讲，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将得到一定程度的重塑。代表民族独立发展思路的中产阶级民粹思想将明显抬头，而上层寄生、炫耀的意识与下层奔命于温饱的思想都将有所收敛，文化异化将有所消解，主体意识有所加强。

总之，随着 2011 年埃及政局的变化，埃及社会又将经历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这是自穆罕默德·阿里开启现代化历程以来埃及所经历的第四次社会转型，也是埃及中产阶级的第三次崛起。从更大空间看，以埃及变局为主体的 2011 年阿拉伯变局，将可能极大地整合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促使阿拉伯国家逐渐疏离美国等西方阵营，靠近中国等新兴大国。从历史发展看，阿拉伯变局将可能把阿拉伯世界从“粉碎性骨折”的低谷中推出，从而改变阿拉伯世界的颓势，促使阿拉伯骨骼进入弥合与恢复期。当然，这将是十分漫长的一个历史过程。

Middle Class and the Changes of Egyptian Political Situation

DAI Xiaoqi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ucture of Egyptian society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explains the reasons of its social changes in 2011. It is believed that Sadat-Mubarak administratio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had led to distortions in Egyptian social structure, and caused the fall of the middle class, then destabilized Egyptian society.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basic logical track of Egyptian changes and middle class, the middle class ultimately subvert the Mubarak regime. This paper does not only analyze internal factors, but also the external factors--the difficult historical situation and the huge international pressure of Arab countries like Egypt.

Key Words Egypt; Middle Class; Changes of Political Situation; Arab Turmoil

(责任编辑: 钮 松)